

不梳洗室玉往工房去後誰知代玉走來見室玉不在
巧翻出昨兒的莊子來看至所價之處不齊又氣又嘆
云

無端天事是何人

作踐南華莊子因

獻芹集

特醜語怪他人

周汝昌著

見此詩石長

也往工房來見實母後往王夫人處來誰知鳳姐之
夫未診候大夫便說替夫人切切們道喜姐也發怒

献芹集

周汝昌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8.375 字数: 421千字

1985年3月第1版 1985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册

*

书号: 10088·868 定价: 2.50元

目 次

《献芹集》序-----黄裳（ 1 ）

自 序-----（ 8 ）

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 18 ）

椽笔谁能写雪芹-----（ 21 ）

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 29 ）

齐白石和曹雪芹故居-----（ 87 ）

曹荃和曹宣-----（ 90 ）

红楼梦版本常谈-----（ 95 ）

异本纪闻-----（ 111 ）

《红楼梦》原本是多少回？-----（ 121 ）

《红楼梦》的情节和结构-----（ 136 ）

红海微澜录-----（ 162 ）

“金玉”之谜	(171)
《〈石头记〉探佚》序言	(187)
曹雪芹所谓的“空”和“情”	(191)
伟大的不幸	(210)
红学的艺术 艺术的红学	(217)
红学辨义	(225)
红学的几个侧面观(正、续篇)	(232)
《红楼梦》艺术谈	(292)
《红楼梦》的笔法	(298)
《红楼梦》欣赏一隅	(321)
关于曹雪芹的重要发现	(328)
再谈曹雪芹小像	(332)
雪芹小像辨	(335)
曹雪芹小像之新议论(上、下)	(336)
脂砚小记	(346)
题画像诗考	(351)
《红学小史》序	(359)
《红楼识小录》序	(363)
红边小缀	(366)
也谈“觚觔畢”和“点犀螯”	(375)
曹雪芹和“疆場”	(382)
林黛玉的《庄子》是什么版本?	(386)
北京竹枝词和《红楼梦》	(389)

《红楼梦》的流行	(392)
《红楼梦》中的女性美	(395)
莲池北岸的天香楼	(399)
《红楼梦》食谱闲话	(401)
曹雪芹的“用典”	(404)
红楼四壁驻长春	(407)
芹溪与玉溪(谿)	(412)
定庵诗境证红楼	(417)
《石头记人物画》题诗别记	(421)
曹雪芹的手笔“能”假托吗	(428)
由楸亭诗谈到雪芹诗	(431)
再商曹雪芹卒年	(441)
曹雪芹卒年辩(上、下)	(450)
曹雪芹生于何月	(479)
《红楼梦》“全璧”的背后	(483)
美红散记	(533)
陌地红情	(552)
——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诗话	
国际红学会	(558)
附录(一)	
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568)
——《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	

附录(二)**曹雪芹的生年****——答胡适之先生—— (574)****编后—— (580)**

《献芹集》序

黄 裳

五十年前在天津的南开中学读书。对这学校，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这里不想过细研究。我只是想说，它留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特别是那自由的学习空气，至今想起来也还使人感到温暖亲切而不易忘记。完全没有以投考名牌大学为唯一目标而进行的填鸭式教育；舍监的面孔虽然严肃，但其实也还是宽容的。正规教学之外，课外活动是那么多种多样：体育，演戏，编印校刊，假日旅行，听演讲，学做陶器，养花……真是花样繁多，不过一切任听学生自由参加，并不作硬性的规定。图书馆里有着不算寒伦的藏书，学校附近有三家书店，出售新刊的书报杂志。学生有很好的机会接触新的思潮和新的文化。我知道学校当局曾经没收过北新书局出版的《结婚的爱》，因此受到《语丝》的批评，不过这是我入学以前发生的事了。对我的宿舍床头小书架上排满的新书，舍监查房时确曾多次有兴趣地注意过，但并不没收其中的任何一册。《水星》出版后，校园里出现了几张小小的征订广告，通讯地址就在教员宿舍，那是由李林先生代理的。在这《水星》上，我第一次读到卞之琳、何其芳的诗。国文班上孟志孙先

生给我们讲古典文学和考证。这当然就有些失之艰深，但他用天津腔曼声长吟《桃花扇》“餘韵”的神情，实在是引人入胜的。他指定的课本之一是戴东原的《屈原赋注》，这书我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买。可是第二天同学周杲良带了一本宣纸印刷非常阔大的一木刻本来，却使我真的开了眼界。这是他的父亲周叔弢付雕的、有名的“建德周氏刻本”。这应该说是我对版本学最早的启蒙读物。

我在这里提起这些琐细的旧事，只是想表示我对这种教育方法的感谢。老师并不给学生规定某些未来的学习目标，只是像“抓周”似的在盘子里安放许多好玩的事物，任凭孩子自己选取。选择的机会倒是越广越多越好。当然像贾宝玉那样一下手就抓来了口红也没有引起紧张的必要，可能这正是一种最好的抉择也说不定。后来许多同学的未来事业都是最初从这里开始的。

人们真的选择了五花八门各自未来的胜业。

因为同级同组的关系，汝昌和我住在一间寝室里。他是天津咸水沽人，比我大两岁，平常总是缄默地不大开口。细长的身材，清疏的眉眼，说起话来也是细声细气的。他从高中一年才插班进来，一开始好像不大容易接近，看来他已不再是小孩，而是一个快要成熟的青年了。他从不参加体育活动，只是爱听戏，京戏、昆曲都喜欢。他还偶尔粉墨登场，记得后来他送给我一张《春秋配》里李春发的戏装照片，就是在燕京大学读书客串演出时拍的。这种共同的兴趣使我们找到了第一个共同点。

不久我又发现他喜欢诗词，并曾熟读《红楼梦》。这就在我们中间出现了新的、更有兴趣的共同点了。这时我们的谈话开始多起来，谈论的主题也集中在《红楼梦》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晚饭以后，走出校门，经过南楼、体育场、女中宿舍楼，到

墙子河边散步时，谈论的就多半是这个。那真是兴致盎然，杂以激辩，直至回到宿舍还往往不能停止。以我当时的年纪、水平，对《红楼梦》的欣赏怕还停留在《菊花诗》和《螃蟹咏》上面。汝昌当然比我高明得多，好像已经在注意曹家的故事和作者的生平了。可以说，这就是《红楼梦新证》的最初的发轫。当时的谈话内容今天几乎一点都记不起了。但汝昌的研究《红楼梦》早在五十年前即已开始，这一节我想是可以作证的。

《红楼梦》的研究达到了今天的规模与水平，不用说，在五十年前是梦想不到的。汝昌也一直坚持着他的研究，在“新证”之后又写出了不少专著与散篇论文。多少年来我一直以一个普通读者、“槛外人”的身份偶尔注意着他的工作。现在他的一本新的论文集将编成问世，来信希望我写几句话在前面。这是推辞不掉的，可是又完全没有发言的资格，只能简单地说几句空话。当然，在说着空话的时候，也不免要带出一些零碎的感想，看来比起五十年前的水平也高不了多少，但不也说明了有些设想已经坚持了那么久还没有改变的事实么？如果有谁指出这就是“僵化”，那也没有什么法子想。

好象也是汝昌曾经提出过的，《红楼梦》研究应有内外学之分。看来这好象是一句笑话，不过却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换一种说法，目前的“红学”大致似乎可以分为两大流派，一支是从文学评论的角度出发，一支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着眼。事实上情形也正是如此。照我的看法，这两支研究大军是应该齐头并进的。而前者的工作应以后者的成果为基础。倒不是说要等彻底弄清了康、乾之际政治、社会、经济的情况之后再来进行《红楼梦》的艺术探索，这是不切实际的可笑的想法。但前一步工作做得愈深入、踏实，后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得到更大的收获。这一“存在第

一”的真理，是已由过去的研究经验充分证明了。想根除一切空论，舍此并无他法。

我一直在想，有许多重要的古典名著，如李杜元白诗，如《东京梦华录》、《梦溪笔谈》、《辍耕录》，是都应该进行全面的整理、笺注、研究的。这工作做得好，我们就往往有了一部具体的断代的社会史、科技史、经济史……。有了一部《玉溪生年谱会笺》，即使非常不能令人满意，不也使我们对唐代后期文、武、宣三朝的政治生活看到一点依稀的轮廓了么？而在这一意义上，恐怕没有另一部书能比得上《红楼梦》。那简直是无比的明、清之际下迄康、乾“盛世”的一部极丰富的社会史，值得写出百来篇重要论文，在这基础上从而写出一部活生生的社会风俗史来。文学评论如能建筑在这样的基石上，可以断言开出来的必非徒眩人目的“唐花”。

《红楼梦新证》所表现的这一特色，汝昌曾经坚持了几十年，我觉得应该更自觉地坚持下去。这中间可能出现过偏离，出现过枝节性的迷惑，但只要大的趋向不错就用不着逡巡。

传记要围绕着传主来写，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红楼梦》研究围绕着曹雪芹来做，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人们说“红学”已经变成了“曹学”，这批评是尖锐的，但也只有在研究已经对著作与作者本身毫无意义时才是如此。人们也曾对“曹雪芹卒年”这样的讨论表示不耐。其实对这么一位伟大的作者连生卒年都弄不清楚，也并非什么光彩的事！不清雪芹的生卒年，又怎能确知他的生活时代，家族与社会政治生活的变化，又怎能具体分析作品产生等种种微妙因素呢？

繁琐也是一种相对的概念。在某些人从某一角度看来是“繁琐”的，换一副眼光，采取更广阔的视界，结论恐怕就两样。不

能要求广大读者都是具有如此深广的兴趣，但在文学批评家，是应该更好地理解什么才是界限的。

细琐、隐曲的研究倾向是确实存在的。我想主要原因之一怕是缺乏较为高远的眼光，又没有向广阔的历史“荒原”进军的勇气，因而只能陷于枝节的钩索、搜寻，浸渐形成一种泛滥无归的状态。这才是值得议论的。

即以清初下迄乾隆这一历史阶段而论，目前就依然是一片未经开垦的“荒原”。遗存下来的实物、文献资料，虽然历经劫火，还是十分之丰富。现在仅就地志、文集、笔记……这一角落而论，恐怕就没有人能报得出一笔总帐，更不用说泛览一过了。我相信，这中间是包含着大量直接间接与《红楼梦》有关的资料的。《红楼梦》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这就要求我们以百科全书式的研究方法对待。说“红学”是“曹学”是目光过于偏浅了。大规模的开垦发掘，能带来怎样的收获，是无法悬揣的。正如开采一座包含了多种稀有金属的共生矿，经过筛选，分离，无一不是有用的财富。这种规模的研究工作，过去是无法想象的，这不是一二学人用“白首穷经”的方法所能做到的。在今天，就不只是可能，而且是必要的了。可能有人会怀疑，这样一来，岂非更将泛滥而不可收拾？其实这是用不着担心的，不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我们得到的将是一部灿烂的文化史、社会史。它将帮助我们更全面深刻地理解《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照我看，这只能是唯一的途径。

有一件事记得是五十年前汝昌和我就采取了相同的立场的，那就是对高鹗为《红楼梦》添加的狗尾的态度。而这立场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变。小说以一百二十回本传世，是二百年来的既成事实，高鹗给了小说一个“悲剧”的结局，姑不论“兰桂齐芳”那

些混帐话，也应该说是难得的。不过这里有一个科学态度与真实性的问题。假的总是假的，不论挂着羊头的狗肉行销了若干年，也到底不是羊肉。因此，每逢读到某些论《红楼梦》的洋洋洒洒的论文，一旦发现它引用了后四十回的文字作为分析论断的依据，就废书不观了。因为首先在科学态度上作者就已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地位，这样得出的结论，到底要由曹雪芹还是高鹗来承当？或按三与一之比计算份额？除了流行的百二十回本，就还有《红楼圆梦》、《续梦》……等不计其数的续作，这些作者似乎也有要求评论家予以考虑的权利。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俞平伯先生作完《八十回校本》，将高续四十回作为附录放在后面的办法是合适的也是通情达理的。尽管许多人为高鹗提出过许多辩护的理由，但到底改变不了事物的本质。研究者不首先分清真伪的界限，终将无法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司马迁说过，“文王囚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这可能是我国最早涉及生活与创作关系的有名见解，真不能不使我们佩服。可是比起文王、孔丘、屈原……韩非来，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可是丰富复杂得多了。他有幸比他的前辈们迟两千年出世，社会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他看到的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封建末世，经历的是变幻多方、寒温异态的世相人情。这许多都不是他的前辈所能比拟的。曹雪芹和屈原一样，也发出了他的无数“天问”，不过他没有把回答写成诗，而是一部《红楼梦》。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追寻曹雪芹作出了一系列怎样的答案，和他为什么要作出这样而不是那样的答案。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是首先设法弄清在曹雪芹的头脑里到底有着怎样的问题。至于他怎样将答案通过形象、故事表达出来，那是文学评论家的事情了。

以上所说，看来无非也还是一堆空话。五十年匆匆过去了。

回想当年热烈讨论、争辩的光景，还依稀如昨。可是汝昌经过了长期艰难的跋涉，却已很跨出了几步。自然不能说他是笔直地前进的，人间又哪能有这等事。但终于走出了一段路，基本的方向也没有大错。这是值得高兴的。也是我虽然惭愧到底还是说出了这一堆空话的原因。

一九八二·二·廿八

自序

和红学结下因缘，从明确的意义讲，总在三十年代。二十年代的我，还看不懂《石头记》——开过几次头，都读不下去，只好掩卷收书而罢。但在初中时候，胡乱学写诗词，那种小令和七言歌行，却都不是直接来自宋篇唐句，而是带着一眼可见的“柳絮词”“葬花吟”的影响痕迹的“学语”之作。其时年龄十三、四至十五岁之阶段也。到了高中时期，是在有名的南开中学，和老同窗黄裳兄住同屋（那时还叫做“斋”，这宿舍名称包含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饶有意味）。我们二人，志趣略同，都酷爱文艺，每日晚饭后，情意悠闲，风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墙子河畔为度，饱领落日归鸦之趣，霞天散绮之奇。我们不光是走，嘴里当然在说笑，不知怎的，话题往往落到“红楼”上来。这毕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说不清了，而且所谈的到底涉及哪些点或面？也是不能追忆的了。只记得曾论及一义：像“红楼”这样的中华文学之菁英，必须译成一部精确的英文本，使世界上的读者都能领略一二。于是，黄裳兄遂发一问曰：我们有“红学”这个名目，可惜外国还不懂得，比如英文里也不

会有这个字呀，这怎么办？我当即答言：这有何难，咱们就能造（coin）一个新字，就是redology！他听了大笑。

此情此景，如在目前，而年华一箭，早是五十来年过去了。黄裳兄给香港报刊撰小文，好像也提到过我们两人南中晚步的往事（他指出我对研红的规模意度大致已具于彼时了），不过他未必涉笔及此——创造英文“红学”的掌故。至于redology这个字，迟早会收入《牛津大字典》的，对此我曾说过我是相信不疑，无须多说的。

那是三十年代。我和他因“九·一八”侵略炮火流离星散，不相闻者十馀载。到我们再通信，已经是全国解放了——那是他因见《燕京学报》上有我写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一文，将其中一节文字（可能是第二节《脂砚斋》吧）转载于上海《文汇报》，来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报所刊读者撰文表示赞同的资料。他对我的研红事业始终关切，并且在每一个进展阶段上都以不同的方式支助于我——但我此刻要表的，还不是我们两人的学谊交期（因为实非数言可尽，须俟专文）；如今借此也可说明，我这个人，虽然确实比有的人是“余生也晚”，但比他们开始研究红学要早三、四十年呢。

但《红楼梦新证》落笔却晚多了，实撰于一九四七至四八年，当时被认为是一部巨著，倘若核实了，却只是一个学期的课余和两个暑假的时间。那真正是因陋就简，草草成篇。因为那时正写西语系的毕业论文，而题目又是向西方介绍陆机《文赋》，所涉甚繁，本不能精心专注，一力研红，何况一个基础不佳、八年沦陷、学殖荒落的我，又怎能在此时此际写出比较理想的红学著作呢？然而就是这样一本书，也发生了不小的影响。红学界对它颇有一些评论，无论毁誉，当然都是对它的不弃和关注，志而弗

援；但能从红学史的发展角度来论述它所给予后来者（1953年以次）的影响的，却不多见。比如，研论红学史，而只会就事论事，就书论书——都是当作个别的、孤立的事物去“处理”“对待”，而不知道应该着重指明一部著作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位置和作用影响，那就失去了史的性能职责。对“新证”的评价，最近却有周策纵教授的一句话，他说：“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红楼梦》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期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曹雪芹小传》序）这样的评价，我在别处是没有听到过的，自然也倍感惭愧；不过，周策纵教授是一位在国际上有声望受尊敬的学者，我们前此并不相识，用金钱、势力、情面等物向他索买颂语谀词，是办不到的。他那一句话，语有斟酌，字具斤两，包括着具体内涵而非一般泛泛之言可比，我虽愧难克当，却也仔细地想了一番，体会他学力与识力的高度。我以为，最主要的就是他不同于那些就事论事派，而是从史的角度（同时也即是一种高度）去看问题，因此他第一点就指明：自从有了“新证”，现代红学才进入又一个新的时期。他实际上是说：1919年五四运动兴起后，新思想新文化的潮流把旧来通俗小说的身价提高了，胡适于1922年即进行《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如从1922年算到1951年我将“新证”全稿交付出版者，正好经历了三十年的时间；从《新证》出现以后，红学（严格意义的红学，不包括一般小说学家对《红楼梦》的赏析评议之类）才真正向前阔步前进。只有从这一历史眼光来看问题，始见周策纵教授之洞明红学，深具史识。所谓划时代，就是说，如果没有某一事物，就不会迅速涌现随它之后的各种事态的进

展。“新证”所考明的事实与所提出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红学的重新兴旺，“新证”以后的红学著作，几乎没有一部不是可以在其中看得到“新证”的营养和启发的，包括那些驳难、攻击和毁谤“新证”的文字中所表现的红学知识和观点。周策纵教授用笔点出：“汝昌在考证方面给红学莫立了许多基础工作，在讲论方面也引起了好些启发性的头绪。”这都不是所有的人所能看到或者愿意承认的。

上面这些，因与这本红学论文集有着干连，故而在此一叙。比如，搜集、整理雪芹家世资料而加以考订的，不自我始，但《红楼梦》的真正的时代背景，曹氏这个家族在清代史上的身份地位，曹李两家与皇室的实际关系和他们随政局变故而遭受的后果，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当时满洲统治阶级的分化，满汉民族文化的汇合，以及所有这些时代条件所给予曹寅、曹雪芹的思想影响，《红楼梦》这部作品的内容与艺术的所以出现——首先是它的产生的可能的重要原因——这都不是“新证”以前的红学论著（胡适也好，李玄伯也好）所曾和所能认识或注意探索的。而在“新证”问世以后，有的人却好象“早都知道”，把它“拿来”当作“常识”似的谈讲起来，甚至夹枪带棒，倒打一耙。一比之下，周策纵教授的话，就显得那才是懂得历史的学者的眼力和态度了。

本集以内所收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丛话》一组文章，就属于方才所说的这一类。记得发表之初，鲁迅研究老专家杨霁云先生赐信鼓励，说：望眼欲穿，才得一篇续出！——那时每月登出一节文字。杨先生此后屡屡叮嘱，此文必须续成完篇才是（注一）。同

（注一）从五十年代起，每次遇到杨先生，他总是毫无例外地对我说：红学的研究，还是要作下去，不要弃置、消沉。他的鼓励的心意，使我深为感动。